

序跋精粹

# 谈谈我们都热爱的北京的前世今生

肖复兴

1. 关于北京的书写,我起步很晚,最早于1995年。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叫《北京人》的小书。尽管这本书后来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又在我国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有一定的影响,但我自己知道,这本书写得匆忙,很是单薄,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都没有写到。一直想有时间好好写。只是那一年,即1995年的夏天,我调到作协,参与办刚刚复刊的《小说选刊》,工作一时有些紧张,以后的写作兴趣又未完全集中在这里,便把这计划拖了下来。

一直到2003年的年底,有一天,到人大开会,会议结束,忽然想这里离我小时候住的大院不远,往南,过前门楼子,再往东拐一点儿,就走到了小时候一天恨不得跑八趟的西打磨厂老街。便走回老街,一直走到老院。我已经有十多年没去那里了,老街变化不大,和我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但看到满街贴着拆迁的告示,很多老房子的外墙上,用白灰涂抹着大大的“拆”字,还是有些触目惊心,心里暗想,幸亏来了,要是再晚一点儿,恐怕就看不到童年的老街老院了。

写作的念头,像飘飞的风筝一样,又被牵了回来。我想,得抓紧时间写了。

2004年初,在西单打磨胡同旁,每天上午有半天的脱产学习。吃完午饭,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还有一杯水,开始往胡同一带跑。西单离前门不远,坐22路公交车,几站地,我父亲当年的工作单位,在西四新华书店旁的税务局,小时候,找父亲,常坐22路公交车,算是轻车熟路。

我并不是出生于北京,而是生于河南信阳。不过,刚刚出了满月,母亲就抱着我到了北京。说来有些惊心动魄,1947年之春,正值战乱,火车站上的人非常多,转车的时候,母亲抱着我,没有挤上火车,只好等下一趟。这趟火车开到离北京很近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前面那趟火车开到丰台,突然爆炸了。如果母亲抱着我挤上了那趟火车,可能也就没有我了。

来到北京不久,我们一家便住在西打磨厂粤东会馆里,从落生不久到童年到青年,一直住到1975年,才搬家离开了老街老院。除了1968到1974年去北大荒六年,其余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吧。因此,对于北京,尤其是前门外的城南地区,非常熟悉,充满感情。重回老街老院,如见风雨故人,一切依然那么熟悉。

那时候,拆迁虽然日隆,但并未大面积地展开,很多地方,老街老院老店铺老门联老门墩老影壁老树,连大门前的房檐上当年元宵节挂灯笼的铁钩子,生了斑斑锈迹,都还在。尽管访旧半为鬼,毕竟老街坊还健在。回顾前尘往事,旧景故地,仿佛并未远去。他们熟悉我,即使以前不认识的,架不住我常去那里,他们也认识了,甚至连拆迁办的人也都知道了。有的人,见到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无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者,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我不了解的事情,对这些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只要想起那些老院落里,他们和我攀谈的情景,心里就会充满感动,也会有些许的伤感,十七八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八十多岁的老人,不知道如今还在不在。

我感谢他们。他们是真正老北京人,比有些坐在会议室或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却不间断大拆大建的人,对老北京更具感情。

2. 那几年,我常常游走于城南。这些大街小巷,完全像一个“胡同串子”。也遇见不少逛胡同的人,他们都很年轻,成群结队,背着专业的相机,拼命地为这些即将消失的老北京景象拍照留档,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可以将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让更多关注北京的人看到。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队伍,到草厂二条的一个小四合院,一边吃着他们做的炸酱面,一边听他们串胡同拍胡同的见闻和体会,能感受到他们对老北京的热爱和探寻的殷殷之情。

有时候,也会碰见外国人,记得在新开路和南孝顺胡同,我碰见的那两拨外国人,前者骑着自行车,后者背着旅行包,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只能相视一笑。那些破旧甚至破败的胡同和院落,让他们觉得还像老北京。有一次,在前门新开通的东侧路,我碰见一些来自美国的大学生,都是学中文的,会说一些中国话。他们正在看刘老根大舞台,我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对我说,以前门楼子为中心,东西两边的胡同,他们都去了一些,觉得西边拆得少,更像他们读过的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老北京,东边不像了。他们指着刘老根大舞台新建的金碧辉煌的牌坊,这样对我说。

朋友走在这样的老街,碰见这样的新旧朋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仿佛往昔时光中穿越的感觉,回忆和现实、幻觉和错觉,交织一起,碰撞一起,常让我感到似是而非而无所适从。我想起梁思成先生1947年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和保护》一文;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又多次陈情:北京城的整体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他特别强调,承继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之遗产,需要做的是整体保护这一文物环境。

如今,我们却在迫不及待地拆,破坏这一整体的文物环境。我们做的这一切,值得吗?在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伦理指引下,将旧的胡同和院落拆掉,建立起的新楼盘和宽阔的马路,就一定更有价值吗?

3. 就这样,我边走边看边记边写,尽管我的笔头赶不上拆迁的速度,这十多年还是陆续写了《蓝调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删章》(2007年)、《北京人(续)》(2013年)、《我们的老院》(2017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20年)和《天坛六十记》(2021年)几本小书。面对北京这部大书,写得远远不够,只能算是完成了我的一点点心愿吧。

4. 书写北京,一直有众多人前仆后继,各类书籍异常丰富。这些前辈,一直是我的榜样。不谈明清两代,民国时期,陈宗蕃、张江裁、李家瑞和侯仁之四位前辈的书,一直置放在我的案头和床头。

陈宗蕃先生1930年出版的《燕都丛考》,已经被我翻烂,几处贴补,伤痕累累。这本书所书写的京城历史与地理沿革之变迁,其丰富与翔实,不仅超出清末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也为后来者所少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今所有书写或关注老北京的人,尤其是关注老北京城池与街巷的人,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张江裁(字次溪)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其中有他挖掘、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单》《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北京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不仅如此,他还有过身体力行,年轻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

5. 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我读到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的书。此书是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早期的边疆之城,到元明清的王朝之都;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元大都城、明清都城;侯仁之先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北京这座古城政治历史与地理地位的变迁。他以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现代治学理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地理的专著。其占有材料之丰富,实际田野考察与研究的功夫之深厚,并有着自己精确的手绘图,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七十余年,仍未能有一部书可以超越这本著作。而且,迄今所有关于北京历史地理方面林林总总的书籍,所论述的观点、所涉及的材料,所引用的典籍,都未

6. 这本《燕都百记》,与以前写的这几本关于北京的书,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是在写作之前想的

7. 西单打磨胡同旁,每天上午有半天的脱产学习。吃完午饭,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还有一杯水,开始往胡同一带跑。西单离前门不远,坐22路公交车,几站地,我父亲当年的工作单位,在西四新华书店旁的税务局,小时候,找父亲,常坐22路公交车,算是轻车熟路。

我并不是出生于北京,而是生于河南信阳。不过,刚刚出了满月,母亲就抱着我到了北京。说来有些惊心动魄,1947年之春,正值战乱,火车站上的人非常多,转车的时候,母亲抱着我,没有挤上火车,只好等下一趟。这趟火车开到离北京很近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前面那趟火车开到丰台,突然爆炸了。如果母亲抱着我挤上了那趟火车,可能也就没有我了。

来到北京不久,我们一家便住在西打磨厂粤东会馆里,从落生不久到童年到青年,一直住到1975年,才搬家离开了老街老院。除了1968到1974年去北大荒六年,其余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吧。因此,对于北京,尤其是前门外的城南地区,非常熟悉,充满感情。重回老街老院,如见风雨故人,一切依然那么熟悉。

那时候,拆迁虽然日隆,但并未大面积地展开,很多地方,老街老院老店铺老门联老门墩老影壁老树,连大门前的房檐上当年元宵节挂灯笼的铁钩子,生了斑斑锈迹,都还在。尽管访旧半为鬼,毕竟老街坊还健在。回顾前尘往事,旧景故地,仿佛并未远去。他们熟悉我,即使以前不认识的,架不住我常去那里,他们也认识了,甚至连拆迁办的人也都知道了。有的人,见到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无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者,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我不了解的事情,对这些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只要想起那些老院落里,他们和我攀谈的情景,心里就会充满感动,也会有些许的伤感,十七八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八十多岁的老人,不知道如今还在不在。

我感谢他们。他们是真正老北京人,比有些坐在会议室或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却不间断大拆大建的人,对老北京更具感情。

2. 那几年,我常常游走于城南。这些大街小巷,完全像一个“胡同串子”。也遇见不少逛胡同的人,他们都很年轻,成群结队,背着专业的相机,拼命地为这些即将消失的老北京景象拍照留档,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可以将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让更多关注北京的人看到。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队伍,到草厂二条的一个小四合院,一边吃着他们做的炸酱面,一边听他们串胡同拍胡同的见闻和体会,能感受到他们对老北京的热爱和探寻的殷殷之情。

有时候,也会碰见外国人,记得在新开路和南孝顺胡同,我碰见的那两拨外国人,前者骑着自行车,后者背着旅行包,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只能相视一笑。那些破旧甚至破败的胡同和院落,让他们觉得还像老北京。有一次,在前门新开通的东侧路,我碰见一些来自美国的大学生,都是学中文的,会说一些中国话。他们正在看刘老根大舞台,我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对我说,以前门楼子为中心,东西两边的胡同,他们都去了一些,觉得西边拆得少,更像他们读过的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老北京,东边不像了。他们指着刘老根大舞台新建的金碧辉煌的牌坊,这样对我说。

朋友走在这样的老街,碰见这样的新旧朋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仿佛往昔时光中穿越的感觉,回忆和现实、幻觉和错觉,交织一起,碰撞一起,常让我感到似是而非而无所适从。我想起梁思成先生1947年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和保护》一文;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又多次陈情:北京城的整体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他特别强调,承继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之遗产,需要做的是整体保护这一文物环境。

如今,我们却在迫不及待地拆,破坏这一整体的文物环境。我们做的这一切,值得吗?在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伦理指引下,将旧的胡同和院落拆掉,建立起的新楼盘和宽阔的马路,就一定更有价值吗?

3. 就这样,我边走边看边记边写,尽管我的笔头赶不上拆迁的速度,这十多年还是陆续写了《蓝调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删章》(2007年)、《北京人(续)》(2013年)、《我们的老院》(2017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20年)和《天坛六十记》(2021年)几本小书。面对北京这部大书,写得远远不够,只能算是完成了我的一点点心愿吧。

4. 书写北京,一直有众多人前仆后继,各类书籍异常丰富。这些前辈,一直是我的榜样。不谈明清两代,民国时期,陈宗蕃、张江裁、李家瑞和侯仁之四位前辈的书,一直置放在我的案头和床头。

陈宗蕃先生1930年出版的《燕都丛考》,已经被我翻烂,几处贴补,伤痕累累。这本书所书写的京城历史与地理沿革之变迁,其丰富与翔实,不仅超出清末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也为后来者所少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今所有书写或关注老北京的人,尤其是关注老北京城池与街巷的人,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张江裁(字次溪)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其中有他挖掘、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单》《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北京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不仅如此,他还有过身体力行,年轻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

5. 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我读到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的书。此书是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早期的边疆之城,到元明清的王朝之都;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元大都城、明清都城;侯仁之先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北京这座古城政治历史与地理地位的变迁。他以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现代治学理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地理的专著。其占有材料之丰富,实际田野考察与研究的功夫之深厚,并有着自己精确的手绘图,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七十余年,仍未能有一部书可以超越这本著作。而且,迄今所有关于北京历史地理方面林林总总的书籍,所论述的观点、所涉及的材料,所引用的典籍,都未

6. 这本《燕都百记》,与以前写的这几本关于北京的书,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是在写作之前想的

7. 西单打磨胡同旁,每天上午有半天的脱产学习。吃完午饭,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还有一杯水,开始往胡同一带跑。西单离前门不远,坐22路公交车,几站地,我父亲当年的工作单位,在西四新华书店旁的税务局,小时候,找父亲,常坐22路公交车,算是轻车熟路。

我并不是出生于北京,而是生于河南信阳。不过,刚刚出了满月,母亲就抱着我到了北京。说来有些惊心动魄,1947年之春,正值战乱,火车站上的人非常多,转车的时候,母亲抱着我,没有挤上火车,只好等下一趟。这趟火车开到离北京很近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前面那趟火车开到丰台,突然爆炸了。如果母亲抱着我挤上了那趟火车,可能也就没有我了。

来到北京不久,我们一家便住在西打磨厂粤东会馆里,从落生不久到童年到青年,一直住到1975年,才搬家离开了老街老院。除了1968到1974年去北大荒六年,其余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吧。因此,对于北京,尤其是前门外的城南地区,非常熟悉,充满感情。重回老街老院,如见风雨故人,一切依然那么熟悉。

那时候,拆迁虽然日隆,但并未大面积地展开,很多地方,老街老院老店铺老门联老门墩老影壁老树,连大门前的房檐上当年元宵节挂灯笼的铁钩子,生了斑斑锈迹,都还在。尽管访旧半为鬼,毕竟老街坊还健在。回顾前尘往事,旧景故地,仿佛并未远去。他们熟悉我,即使以前不认识的,架不住我常去那里,他们也认识了,甚至连拆迁办的人也都知道了。有的人,见到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无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者,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我不了解的事情,对这些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只要想起那些老院落里,他们和我攀谈的情景,心里就会充满感动,也会有些许的伤感,十七八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八十多岁的老人,不知道如今还在不在。

我感谢他们。他们是真正老北京人,比有些坐在会议室或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却不间断大拆大建的人,对老北京更具感情。

2. 那几年,我常常游走于城南。这些大街小巷,完全像一个“胡同串子”。也遇见不少逛胡同的人,他们都很年轻,成群结队,背着专业的相机,拼命地为这些即将消失的老北京景象拍照留档,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可以将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让更多关注北京的人看到。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队伍,到草厂二条的一个小四合院,一边吃着他们做的炸酱面,一边听他们串胡同拍胡同的见闻和体会,能感受到他们对老北京的热爱和探寻的殷殷之情。

有时候,也会碰见外国人,记得在新开路和南孝顺胡同,我碰见的那两拨外国人,前者骑着自行车,后者背着旅行包,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只能相视一笑。那些破旧甚至破败的胡同和院落,让他们觉得还像老北京。有一次,在前门新开通的东侧路,我碰见一些来自美国的大学生,都是学中文的,会说一些中国话。他们正在看刘老根大舞台,我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对我说,以前门楼子为中心,东西两边的胡同,他们都去了一些,觉得西边拆得少,更像他们读过的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老北京,东边不像了。他们指着刘老根大舞台新建的金碧辉煌的牌坊,这样对我说。

朋友走在这样的老街,碰见这样的新旧朋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仿佛往昔时光中穿越的感觉,回忆和现实、幻觉和错觉,交织一起,碰撞一起,常让我感到似是而非而无所适从。我想起梁思成先生1947年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和保护》一文;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又多次陈情:北京城的整体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他特别强调,承继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之遗产,需要做的是整体保护这一文物环境。

如今,我们却在迫不及待地拆,破坏这一整体的文物环境。我们做的这一切,值得吗?在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伦理指引下,将旧的胡同和院落拆掉,建立起的新楼盘和宽阔的马路,就一定更有价值吗?

3. 就这样,我边走边看边记边写,尽管我的笔头赶不上拆迁的速度,这十多年还是陆续写了《蓝调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删章》(2007年)、《北京人(续)》(2013年)、《我们的老院》(2017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20年)和《天坛六十记》(2021年)几本小书。面对北京这部大书,写得远远不够,只能算是完成了我的一点点心愿吧。

4. 书写北京,一直有众多人前仆后继,各类书籍异常丰富。这些前辈,一直是我的榜样。不谈明清两代,民国时期,陈宗蕃、张江裁、李家瑞和侯仁之四位前辈的书,一直置放在我的案头和床头。

陈宗蕃先生1930年出版的《燕都丛考》,已经被我翻烂,几处贴补,伤痕累累。这本书所书写的京城历史与地理沿革之变迁,其丰富与翔实,不仅超出清末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也为后来者所少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今所有书写或关注老北京的人,尤其是关注老北京城池与街巷的人,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张江裁(字次溪)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其中有他挖掘、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单》《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北京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不仅如此,他还有过身体力行,年轻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

5. 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我读到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的书。此书是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早期的边疆之城,到元明清的王朝之都;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元大都城、明清都城;侯仁之先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北京这座古城政治历史与地理地位的变迁。他以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现代治学理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地理的专著。其占有材料之丰富,实际田野考察与研究的功夫之深厚,并有着自己精确的手绘图,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七十余年,仍未能有一部书可以超越这本著作。而且,迄今所有关于北京历史地理方面林林总总的书籍,所论述的观点、所涉及的材料,所引用的典籍,都未

6. 这本《燕都百记》,与以前写的这几本关于北京的书,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是在写作之前想的

7. 西单打磨胡同旁,每天上午有半天的脱产学习。吃完午饭,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还有一杯水,开始往胡同一带跑。西单离前门不远,坐22路公交车,几站地,我父亲当年的工作单位,在西四新华书店旁的税务局,小时候,找父亲,常坐22路公交车,算是轻车熟路。

我并不是出生于北京,而是生于河南信阳。不过,刚刚出了满月,母亲就抱着我到了北京。说来有些惊心动魄,1947年之春,正值战乱,火车站上的人非常多,转车的时候,母亲抱着我,没有挤上火车,只好等下一趟。这趟火车开到离北京很近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说是前面那趟火车开到丰台,突然爆炸了。如果母亲抱着我挤上了那趟火车,可能也就没有我了。

来到北京不久,我们一家便住在西打磨厂粤东会馆里,从落生不久到童年到青年,一直住到1975年,才搬家离开了老街老院。除了1968到1974年去北大荒六年,其余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老北京人了吧。因此,对于北京,尤其是前门外的城南地区,非常熟悉,充满感情。重回老街老院,如见风雨故人,一切依然那么熟悉。

那时候,拆迁虽然日隆,但并未大面积地展开,很多地方,老街老院老店铺老门联老门墩老影壁老树,连大门前的房檐上当年元宵节挂灯笼的铁钩子,生了斑斑锈迹,都还在。尽管访旧半为鬼,毕竟老街坊还健在。回顾前尘往事,旧景故地,仿佛并未远去。他们熟悉我,即使以前不认识的,架不住我常去那里,他们也认识了,甚至连拆迁办的人也都知道了。有的人,见到我,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无论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老街坊,还是素昧平生的陌生者,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我不了解的事情,对这些自以为非常熟悉的一切,有了新的体认。我常常会想起他们,只要想起那些老院落里,他们和我攀谈的情景,心里就会充满感动,也会有些许的伤感,十七八年过去了,那些当年八十多岁的老人,不知道如今还在不在。

我感谢他们。他们是真正老北京人,比有些坐在会议室或主席台上夸夸其谈却不间断大拆大建的人,对老北京更具感情。

2. 那几年,我常常游走于城南。这些大街小巷,完全像一个“胡同串子”。也遇见不少逛胡同的人,他们都很年轻,成群结队,背着专业的相机,拼命地为这些即将消失的老北京景象拍照留档,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可以将这些照片传到网上,让更多关注北京的人看到。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队伍,到草厂二条的一个小四合院,一边吃着他们做的炸酱面,一边听他们串胡同拍胡同的见闻和体会,能感受到他们对老北京的热爱和探寻的殷殷之情。

有时候,也会碰见外国人,记得在新开路和南孝顺胡同,我碰见的那两拨外国人,前者骑着自行车,后者背着旅行包,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我们只能相视一笑。那些破旧甚至破败的胡同和院落,让他们觉得还像老北京。有一次,在前门新开通的东侧路,我碰见一些来自美国的大学生,都是学中文的,会说一些中国话。他们正在看刘老根大舞台,我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对我说,以前门楼子为中心,东西两边的胡同,他们都去了一些,觉得西边拆得少,更像他们读过的老舍《骆驼祥子》里的老北京,东边不像了。他们指着刘老根大舞台新建的金碧辉煌的牌坊,这样对我说。

朋友走在这样的老街,碰见这样的新旧朋友,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仿佛往昔时光中穿越的感觉,回忆和现实、幻觉和错觉,交织一起,碰撞一起,常让我感到似是而非而无所适从。我想起梁思成先生1947年写的《北平文物必须整理和保护》一文;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又多次陈情:北京城的整体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他特别强调,承继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之遗产,需要做的是整体保护这一文物环境。

如今,我们却在迫不及待地拆,破坏这一整体的文物环境。我们做的这一切,值得吗?在破旧立新的城市建设伦理指引下,将旧的胡同和院落拆掉,建立起的新楼盘和宽阔的马路,就一定更有价值吗?

3. 就这样,我边走边看边记边写,尽管我的笔头赶不上拆迁的速度,这十多年还是陆续写了《蓝调城南》(2006年)、《八大胡同删章》(2007年)、《北京人(续)》(2013年)、《我们的老院》(2017年)、《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2020年)和《天坛六十记》(2021年)几本小书。面对北京这部大书,写得远远不够,只能算是完成了我的一点点心愿吧。

4. 书写北京,一直有众多人前仆后继,各类书籍异常丰富。这些前辈,一直是我的榜样。不谈明清两代,民国时期,陈宗蕃、张江裁、李家瑞和侯仁之四位前辈的书,一直置放在我的案头和床头。

陈宗蕃先生1930年出版的《燕都丛考》,已经被我翻烂,几处贴补,伤痕累累。这本书所书写的京城历史与地理沿革之变迁,其丰富与翔实,不仅超出清末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也为后来者所少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如今所有书写或关注老北京的人,尤其是关注老北京城池与街巷的人,都不能不读这本书。

张江裁(字次溪)对北京风土民俗的关注,在那一代人是很突出的。张江裁一生所编纂出版的书目,让人叹服。其中有他挖掘、重新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一岁货单》《燕市百怪歌》等多种,为今天研究老北京留下宝贵的资料。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有哪一位学人肯如此下力气,单凭一己之力,孜孜不倦致力于北京民俗风土志一类书籍的钩沉、挖掘与出版。不仅如此,他还有过身体力行,年轻时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参与北京

5. 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我读到的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出的书。此书是侯仁之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早期的边疆之城,到元明清的王朝之都;从蓟城,到金中都城、元大都城、明清都城;侯仁之先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北京这座古城政治历史与地理地位的变迁。他以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地理相结合的现代治学理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关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地理的专著。其占有材料之丰富,实际田野考察与研究的功夫之深厚,并有着自己精确的手绘图,尽管已经过去了近七十余年,仍未能有一部书可以超越这本著作。而且,迄今所有关于北京历史地理方面林林总总的书籍,所论述的观点、所涉及的材料,所引用的典籍,都未

6. 这本《燕都百记》,与以前写的这几本关于北京的书,有些什么样的区别,是在写作之前想的

题。我不想重复以往惯常的写作方式,而且,关于老北京的历史与文化,我写得够多了,已经无法可再说,希望这本新书能够写得稍微新鲜一些,让我自己多少有些进步。

这一次,我这样要求自己:一要尽可能的短;二将历史的部分,引用典籍的部分,尽可能删汰;三要加强亲历性、现场感;四不止于城南,蔓延至城北更多的地方。

因此,这本小书,并不是对老北京历史地理的钩沉,也不是关于老北京民俗文化的巡礼,只是我自己对北京和北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的拾穗小札。在写作方式上,学习的是布罗茨基所强调的那种创作原则,即“意识中所产生的自然法则”,“也可以这么说,这是粘帖画和蒙太奇的原则。”同时,他还强调:这是“浓缩的原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倘若你开始用类似浓缩的方式写作,全都一样,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写得很短”。

我喜欢这种创作原则,在我的上一本书《天坛六十记》的写作中,曾经尝试运用的就是这种原则。如今,在被资讯焦虑与生活快节奏所裹挟挟下的大多数读者,已经没有足够的耐心读长篇巨制。布罗茨基曾经一言以蔽之:“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我们大家都知道,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都极为短暂”。

这本小书,尽管有一百篇,但每一篇都很短,最短几百字,最长不过两三千字而已。感谢中华书局,感谢本书的责编董邦冠先生,是他们的青睐和鼓励,才有了这本小书的出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在简短的篇幅中,看到北京的新老风貌,看到你。我们也能在书中相逢——正如谈淡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正想找个人交谈,我们正好在这里碰见,谈谈我们都热爱的北京的前世今生。

2022年春节前写于北京

# 巴金给曹禺的一封信

陆正伟

偶然打开1998年记事本,见11月6日记载着:……晚上,巴老在病房看电视,小林问:多年前,《于无声处》赴京演出,你让宗福先给曹禺写过信,我怎不知道?巴老说,信是由彭新琪转交的……

听后,我当时注意力没在这封信上,认为巴老的信在他的全集里早就能看到,而对话剧《于无声处》的关注度更强烈些。所以,《支部生活》的编辑臧利春找我一同听宗福先谈《于无声处》时,我很快就答应了。访谈中,我对话剧《于无声处》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

1976年4月6日,宗福先在上海热处理厂当工人时,有一个朋友路过上海,从他口中得知那几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事件。他也参加了,并直呼其名大骂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听得宗福先心跳加速。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激动,觉得悼念周总理是天地经义的事情。以往,宗福先心中充满疑虑却对谁都不敢说,现在他感到并不孤单,并明白了一个真理:人民是不会永远保持沉默的。

打那时起,他开始搜集资料,酝酿构思。直到1978年5月动笔,用了三个星期,写出了五万字的初稿。同年年初,宗福先到巨鹿路675号参加复刊不久的《上海文学》杂志社举办的文学青年学习班。老编辑彭新琪问他:“你最近在写什么?”宗福先说,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于无声处》,快要上演了。她听后说:“到时候我去看。”同年9月,话剧在市工人文化宫小剧场公演。彭新琪看这部戏时,社会上还没引起轰动,但她看后很激动,回编辑部后向党委推介。同时,该剧也吸引了吴强、黄佐临、茹志鹃、袁雪芬、朱端钧、邵滨生及专程从外地赶来看戏的田华、徐晓钟等文艺界前辈。后来,越演越火。10月12日,《文汇报》为此发表了题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长篇通讯。接着又被破天荒三次在《文汇报》上全文连载了剧本。这下“捅”破了天,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对这部话剧的关注。

我在《巴金全集》“日记卷”中看到巴老在当年的日记中记载着:“1978年10月29日下午,读《于无声处》前三幕,觉

得好。”(《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290页)11月1日:“看电视(《于无声处》后二幕)。”(《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291页)7日晚:“看电视节目(《于无声处》全部)。”(《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292页)

我在“日记卷”中还看到了:“11月6日下午彭新琪来,要我写信介绍宗福先去曹禺。”(《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292页)这下引起了我的重视。巴老写此信时“天安门事件”尚未得到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没召开,“两个凡是”没被彻底否定……我虽读到了巴老为这部话剧叫好的日记,但还是好奇,在当时乍暖还寒的背景下,他在信里是怎样把素昧平生的青年作者宗福先介绍给曹禺的。便立马取出《巴金全集》“书信卷”翻阅查找,结果此信未被收入。后又在网上和有关书刊资料上找,也无功而返。这封信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结。

2020年5月10日,我找宗福先有事请教。两人在电话里正谈论着宗福先探访巴老时说到香港回归前向他筹办的电影《鸦片战争》受到巴老关注的话题,我脑子突然来了个“急转弯”,问起巴老给曹禺的那封信。宗福先似用写剧本的思路和语言不徐不疾地向我叙述起来:1978年11月上旬,《于无声处》剧组接到北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演出的任务后,彭新琪把宗福先叫到《上海文学》编辑部,给他一封信,宗福先展开一看,惊呆了,竟然是巴老介绍他去见曹禺的信!

宗福先喜爱读曹禺和易卜生的作品,对他创作《于无声处》起到了帮助作用。由此,去京前,在彭新琪面前流露过拜见曹禺先生的想法。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一次,彭新琪看望巴老时,说起《于无声处》作者宗福先的愿望。巴老听后说:“好嘛,我替他写封信。”也许好事来得太突然了,宗福先一时激动,就把信抄下来。多年后,他为找此信还托过曹禺夫人李玉茹,她说信已经找不到了。宗福先只留下了巴老的原信是用毛笔写这么点印象。

我正觉得“疑无路”时,他话锋一转,说他现在保存着一份巴老用钢笔抄写的底稿。我听了很兴奋,把自己寻觅这封

信“踪迹”的经过告诉了宗福先。不一会,在我的微信上见到了多年遍找不着的信的内容:

家宝:介绍宗福先同志来看你。他是《于无声处》的作者,这个戏你一定要看看。如果你还有时间,希望你同他谈谈。他喜欢你的作品,看来他对你的作品还下过功夫。你同他谈谈,对他也会有帮助。祝好

巴金  
十一月六日

这正是得来不费工夫。原来,在2012年成立“巴金故居”纪念馆前夕,小林整理巴老的遗稿时发现了这封信,后赠与宗福先作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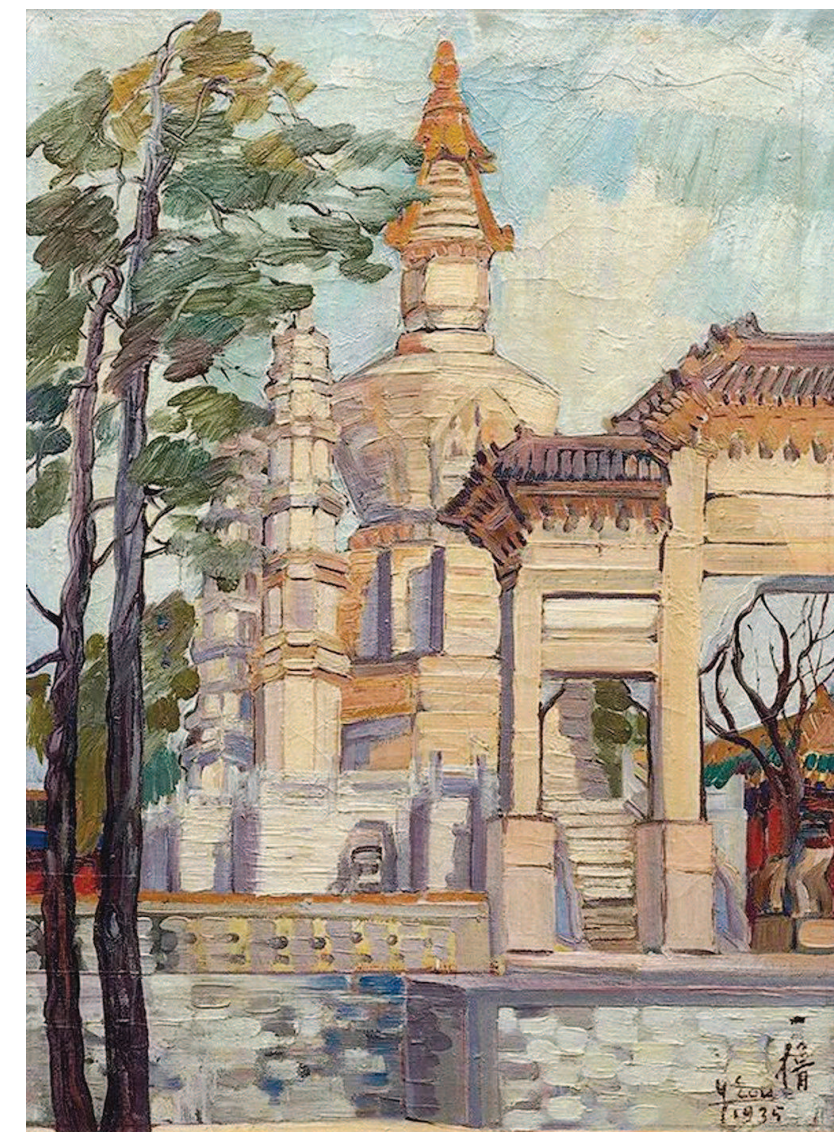
1978年11月14日,《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的当晚,曹禺就邀宗福先到寓所做客。宗福先随之把信交给了曹禺,一老一少促膝长谈至深夜。经过两度与宗福先交谈,曹禺写信回复巴老:

家宝:……你写信给我介绍宗福先同志的信已收到,我已见到宗同志,和他谈了话。下星期中(未离京前)还要和他再谈一次。这位作者十分谦逊,而且平易可亲,写作前途未可限量……

曹禺先生为免受记者采访干扰,能晤谈尽兴,在第二次会面时选了环境幽静的国际俱乐部谈话场地,又邀请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戏剧理论家赵寻参加。三人围绕着《于无声处》这部话剧演出后引发的轰动效应,并结合戏剧艺术的发展前景进行深入广泛的探讨,足足聊了三个多小时……

《于无声处》在京的演出大获成功,又恰逢“天安门事件”平反,顺应了全剧的最后一句台词:“人们不会永远沉默!”同时,因巴老的热情牵线,促成了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与戏剧泰斗连续的对话和交流,在我眼里宗福先真是“有福在先”之人啊。

2021.11.



# 笔会

西黄寺